香炉

灺

□ 吴玉辉

（上接1版）

这是一份极为宝贵的观察分析：

木麻黄的最佳种植气温为25摄氏度，地温为23摄氏度。在东山，5月下旬至7月，气温较稳定，种下的木麻黄3天便足以成活。

种植木麻黄必须掌握六大技术要点：大坑深栽、带土栽种、晴天挖窟、雨天造林、保护管理、防治虫害。

谷文昌要求把这些技术要点印成小册子，分发到各大队、生产小队，人手一册。这些要点和做法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。

1958年12月20日，东山县再次举行植树造林誓师大会。这一次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、掌握科学规律、做好充分准备基础上的植树造林大会战。

从此，东山有了这样壮观的场面：一下雨，广播里马上播送造林紧急通知，东山的干部群众、驻岛部队就冒雨出动，荒山、沙滩布满造林大军。在那些日子里，谷文昌强忍着肺病、胃病的折磨，和班子成员一起，全部身心扑在植树造林上。在沙滩上，在苗圃里，在荒山坡，处处闪动着谷文昌那披着斗篷、永不疲倦的消瘦身影。东山人从这亲切的身影上，感受到共产党人心系百姓、造福人民的情怀，尊重科学、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坚韧不拔、百折不挠的意志。他鼓舞、激励着东山人勇敢地与风沙较量，向贫穷落后抗争，用辛劳和智慧，去实现绿色的希望。

天亦为之动容，连降喜雨，种下的木麻黄成活了，大面积成活了。到了60年代初，谷文昌带领全县人民植树造林82000亩，全岛421座山头披上绿装，34000多亩的木麻黄主干带，在38公里长的海岸线上筑起了一道“绿色长城”。接着，美国湿地松、日本银桦、法国梧桐也相继站稳了脚跟，形成第二道绿色屏障。再下来，是漫山遍野的果树，绿荫掩映中的村庄。整个海岛绿化率达96%以上，岛上风力减弱了41%~61%，冬天温度提高了1.5%，蒸发量减少22%，相对湿度提高10%~25%。

东山岛这只土黄色的蝴蝶变成了绿色的蝴蝶，在碧波万顷的东海上翩翩起舞了。东山人世世代代遥不可及的梦想，终于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实现了。

多年以后，有位台湾同胞回东山探亲时，特地带来一袋树籽，当他看到昔日的荒滩变成茂密的森林，所有的山头都披上了绿装，不由得惊呆了：“奇迹，人间奇迹啊！”

我来到了昔日地处“风口”“沙喉”，而今隐藏在林荫中的山口村，寻找二十几年前清明节那位致富不忘谷书记的老阿婆，或许她知道香炉是谁捐赠的。可是，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她老人家还健在吗？山口行政村有五个自然村，她是哪个自然村的，叫什么名字？虽然事先我和镇上干部取得联系，拜托他们帮助寻找，但是心里依然没底，甚至有几分忐忑。

让我欣喜的是，在山口村敞亮的村部，我见到了这位94岁的老阿婆，她的名字叫何赛玉。一同前来的还有当年植树造林时的生产队长，现已80岁的老人陈细乒。何赛玉阿婆看起来显得很瘦小，满脸的皱纹刻着岁月的沧桑，据说前不久摔伤过，走路还有些不方便，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，老人家的眼神依然明亮，说话口齿也很清楚。当我向她询问为什么每年清明节都要去林子里给谷文昌扫墓时，老阿婆激动地说：“谷书记是我们的大恩人啊！”

老人家向我叙述了她一生的坎坷遭遇：“我出生在海岛北部的前何村，出生后不久，狠心的母亲把我丢在路旁‘放生’。有一个好心人路过时看到了我，不忍心让我这样活活死去，抱着我，走过了一村又一村，求人把我收养。也不知进了多少村庄，就是没有人愿意收养我。后来，在一个叫探石村的地方，遇到了一位从山口村出来要饭的奶奶。这位奶奶从好心人手上接下了快要断气的我。奶奶用她讨乞的地瓜丝汤喂养了我，救活了我。从此，我就生活在奶奶家。”我问道：“那后来这位奶奶呢？”阿婆哽咽着说：“奶奶她在一次外出乞讨的时候，饿死在漳浦县一个叫浦南桥的地方，尸骨都没有找到，我们都没有一个给奶奶上坟的地方。”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流下了热泪。一位靠乞讨度日的老人，却用她一颗善良的心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，然而她自己却饿死在逃荒的旷野中……

一阵静默。我小心地问：“阿婆，你是不是也……”我欲言又止，生怕刺伤阿婆的心。阿婆明白了我的意思：“孩子，你是想问我有没有去讨饭吗，实在见笑（在东山方言中“见笑”是很难为情的意思），风沙把田地都盖住了，种不成庄稼啊，我和当年奶奶一样，提着篮子，端上破碗，到外乡去讨饭。”我问：“那咱们山口村的乡亲是什么时候过上好日子的呢？”坐在一旁的陈细乒老人接过话题：“是谷书记来了，组织我们种木麻黄。木麻黄这种树在下雨天种才容易活。老天一下雨，全村不管男人女人都上场，有的戴着斗笠，有的穿着蓑衣，有的头上裹着破衣服，越是下大雨越是大种树，晚上也不停。谷书记经常到我们村，穿着雨披，跟着我们一起种树，那场面想起来，好像就在眼前。就这样，光我们山口村就种了4600亩的木麻黄。有了这些木麻黄挡住风沙，不仅地上能种庄稼，还种了黑珍珠莲雾，还发展了水产养殖业。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咧着嘴，憨厚地笑了。何赛玉阿婆接上话茬：“我这辈子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。现在，孙子、重孙加起来都有五六十个了。没有谷书记，就没有我今天啊！”老人家激动地说：“等我的腿好了，我还要去给谷书记上坟，带着我的儿子、孙子、重孙，祖孙四代人一起去给谷书记烧香。”我抓住时机问道：“阿婆，你知道谷书记坟前的香炉是谁送的吗？”阿婆想了想说：“我刚去烧香的时候，记得那里摆着一个插香火用的陶罐子，后来就有了石香炉，也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。”


昔日山口村

这时，有位小伙子开着一辆轿车来到村部门口，村支部书记告诉我，这是何赛玉阿婆的外孙，是来接老人家回去吃饭的。

望着渐渐远去的轿车，我庆幸何赛玉老人没有重蹈当年老奶奶的命运，终于有了自己幸福的晚年。何赛玉老人命运的变化，不正是山口村乃至整个东山岛百姓命运变化的缩影吗？

我觉得山口村之行很有收获，然而我依然带着一点遗憾，因为，还没有找到香炉的捐献者。

三

寻找香炉捐献者的线索中断了，我心里有些茫然。

傍晚，我穿过林带，来到离住地不远的马銮湾。漫步在平缓细软的沙滩上，只见海面上渔火闪烁，宛若天幕摇落的星辰，那是渔民用灯光在诱捕“小管”（小鱿鱼）。可我无心欣赏这海上夜景，心思还在那个香炉上。


谷文昌（左二）深入基层调研

忽然，眼前一组画面吸引了我。月光下，几个渔民驾着一条小木船将一张大渔网撒入附近海中。沙滩上，十几个渔民排成两队，每个人腰上系着一条绳子，绳子采用活结系着渔网的粗大绳子，依靠腰力和双手牢牢抓住大绳子往岸上拉。走近一看，拉网的渔民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我忍不住脱掉鞋袜，卷起裤脚，加入拉网的行列。因为说的都是家乡方言，我很快就和拉网的渔民们聊了起来。一位叫阿生的小伙子告诉我，他们是来自附近的铜钵村，祖祖辈辈就在这个海湾拉山网。解放前，都是女人种田，男人捕鱼。拉网时，还一边踩着节奏喊着号子。阿生的话，让我如临其境，我问道：“那为什么后来女人也来拉山网呢？”阿生告诉我，当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抓壮丁，把村里的男人差不多都抓光了，为了生计，女人也只好出来拉网捕鱼，现在女人拉山网就成习惯了。

阿生的话提醒了我，1950年国民党军队撤离时，在东山岛大肆抓壮丁，铜钵村深受其害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寡妇村”。解放后，对这些活寡妇的身份如何认定，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。是谷文昌冒着极大风险，积极提议，对这些苦难深重的活寡妇做出“兵灾家属”的定性，一项德政暖了苦命人的心。谷文昌坟前的香炉会不会就是铜钵村的乡亲们送的呢？

我来到了寡妇村展览馆，老馆长黄镇国陪着我，一边参观纪念馆，一边向我叙述着那段难忘的往事。

1949年6月，一批从淮海战役溃退的国民党部队进驻东山，因为官多兵少，号称“军官团”。同年9月，“军官团”改编为“国防第七纵队”，12月份整编为陆军第58师，师长洪伟达，号称“再生部队”。怎么个“再生”法呢？抓丁，靠抓丁，抓满一个排的，排长升连长，抓满一个连的，连长升营长。

1950年5月10日凌晨2时，洪伟达部突然包围铜钵村，以查户口为名，掳走147名壮丁，其中年幼者仅17岁，年长者55岁，已婚者91人。而当时的铜钵村只有298户1334口人。遭此浩劫的铜钵村，三日不见炊烟，从此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寡妇村”。

两天后，东山解放。时任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五大队三中队五小队队长的谷文昌，随军解放东山岛，并担任了城关区区委书记。铜钵村就在城关区辖区内。在村党支部书记谢老太的陪同下，谷文昌多次来到这个灾难深重的小村庄。

在马銮湾，铜钵村的妇女们汗水夹着泪水，艰难地拉着网绳，唱着以前男人们拉网时唱的号子歌：搬网真艰苦，行是倒退步，食是番薯筴（块），配是鲳仔涂，穿是布袋布，睏是珍珠铺（沙滩），天光搬到日落埠，实在饿死某（妻）囝路。号子声声，撕人心肺……

榕树下，铜钵村的妇女们一边织着渔网，一边唱着自己编词的歌册调：门前海水平波波，哪知人间有银河。多少年来断七夕，何时鹊桥接阿哥？歌声如诉如泣，催人泪下……

池塘边，铜钵村的妇女为了给庄稼戽水，把扁担插在一头，将戽桶一端的绳子系在扁担上，自己背着孩子拽着戽桶另一端的绳子，一桶一桶地从池塘往庄稼地戽水。过去夫妻俩一起戽水变成了单人戽水。戽着戽着，扁担倒下了，戽桶撞碎了，女人的心也随之碎了……

在谢老太书记的陪同下，谷文昌走访了这些苦命女人的家。他发现，这些女人吃饭的时候，饭桌上总是多摆着一副碗筷，那是特地为离别的亲人摆下的。再看锅里，是稀得可以照见人影的地瓜丝汤。他还看到了这些女人用心收藏的一把手电筒、一块银元、一只布鞋……这是她们的男人被抓壮丁时留下的。现在，见物如见人，见物不见人，女人的心在流泪、在流血。此时，她们并不知道面前这位脸庞黝黑、穿着一身褪色军装的中年人就是谷文昌，但直觉告诉她们，这是一位古道热肠、可以倾诉心声的好人。

面对铜钵村女人那无助和痛楚的目光，谷文昌的心阵阵颤动，这些无辜的、苦命的女人，却被当作“敌伪家属”对待，她们承受着亲人分离的苦痛和精神上的煎熬。谷文昌陷入了沉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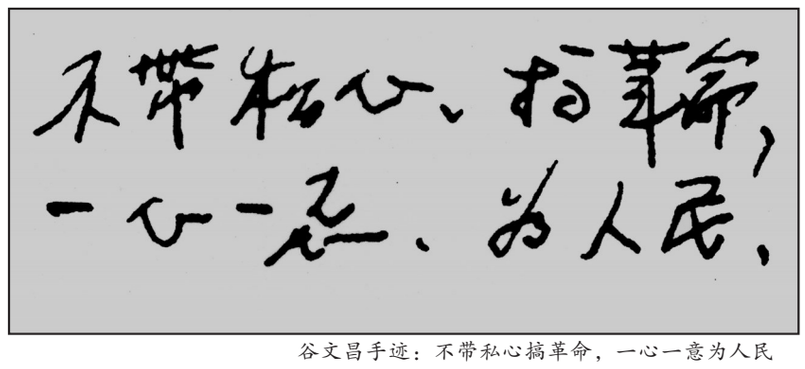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谷文昌担任了县委组织部部长。他了解到，东山岛人口只有83000多人，而国民党军队撤离东山前，先后三次抓丁就抓走4000多人，如果算上社会关系，兵灾涉及的人数接近全县总人口的一半，怎么可以把这些老百姓推到对立面呢？一个大胆而坚定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形成。

县工委五人小组会议上，谷文昌郑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把“敌伪家属”改成“兵灾家属”。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了，有人担心，这涉及政策定性问题，政治风险太大，会不会犯阶级立场的错误。也有人担心，现在东山刚解放，海面上很不平静，岛上敌特活动非常频繁，谁能够保证，敌特和这些国民党兵的家属没有联系？有人建议，以前从未遇到过这么棘手的难题，是不是报给上级，等上级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再讨论。

这是一次关系到兵灾家属政治命运的讨论，作为倡议者，谷文昌承受着巨大压力，也冒着极大风险。然而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担当。

谷文昌平缓而又坚定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：“这些被国民党抓走的壮丁，出身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本分的、穷苦的农民，他们是被国民党用刺刀强行掳走的。离开父母，抛妻别子，并非他们所愿，他们是受害者呀。他们的家人正承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。国民党给她们带来了灾难，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救她们于苦难，她们生活在冰雪之中，我们不能雪上加霜，而应该雪中送炭！”谷文昌停顿片刻，接着说：“我想，只要我们做的事情对党、对百姓有利，上级终究会理解和支持的。”谷文昌的一番话，打动了县委一班人的心。

从此，在东山岛，“敌伪家属”改成了“兵灾家属”，“敌伪”、“兵灾”两字之差，天壤之别。这些原本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人，犹如枯木逢春，政治上有了地位，生活上得到照顾，她们有了做人的尊严，有了活下去的信心。她们带着感恩之心跟着党走，带着满腔热情建设新的家园，带着希望期盼着亲人的归来。


谷文昌手迹：不带私心搞革命，一心一意为人民

党爱人民，人民向党。

“兵灾家属”这项德政的人心效应，在接下来的东山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

四

1953年7月15日晚11时30分，谷文昌（时任东山县长）办公室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。电话是东山守备部队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打来的：“老谷，我们召开一个紧急会议，请你速到我的指挥所来。”

指挥所内，气氛凝重。游梅耀通报了福州军区紧急电报的内容，今晚，敌舰艇十二艘、机帆船数十艘，载兵万余从金门出发，有对我行大规模袭扰之企图。根据判断，国民党军队大约出动了一个加强师，目标很可能就是东山岛。由于守岛部队只有1200人，与进犯之敌力量对比悬殊，叶飞司令员电示，守岛部队可作机动防御，于16日晨4时以前撤出东山岛。然后组织力量，准备反击。

游梅耀说：“我的意见是坚守东山岛，等待大部队的增援。地方党政机关干部连同家属，要在天亮以前全部撤出东山岛，撤出时我派部队负责掩护！”接着，他陈述坚守东山岛的理由：“如果守岛部队撤出，国民党军队登陆后就会利用我们挖好的坑道、修好的工事，给我们实施反击造成很大麻烦。现在，我们进入坑道、工事，就能有效阻击进犯之敌，为增援部队赢得时间。”

谷文昌不停地吸着烟，听完游梅耀的分析，他掐灭了烟头：“我完全赞同游团长的分析。东山县委、县政府、东山的地方干部将会与守岛部队战斗在一起，决不后撤一步。会后我们马上做部署，各乡镇自卫队、救护队在执勤地区集合待命。机关干部、武工队、民兵立即进入岗位，担任战勤和作战任务，全力支援守岛部队。”

谷文昌的一番话坚定了游梅耀的决心，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高兴地说：“好！虽然我只有1200名战斗人员，可背后有83000东山人民的支持。我立即向叶飞司令员报告。”

谷文昌走出指挥所，他下意识地朝着海的方向望去，只见远处，雾气氤氲，透着几分诡秘与莫测。眼前的村庄则显得特别寂静，寂静得出奇，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还沉浸在睡梦中。

东山解放三年来，岛上军民天天搞备战，天天说“狼来了”，这回“狼”真的来了。

国民党军队13000多人，由金门防卫部司令胡琏直接指挥，在海、空军配合下，扑向东山岛。

“高安号”驱逐舰，指挥舱内，胡琏的目光死死盯着军用地图，参谋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战局进展情况。和共军打了多年交道，他不敢掉以轻心。

此次攻打东山岛的作战意图是，配合朝鲜战场，对解放军实行军事上牵制，同时也是“反攻大陆”的一次前哨战。作战计划是，用舰炮火力和航空兵火力掩护部队登陆，在岛之东南侧分三路向北推进；同时空降一个支队于岛之北侧，迅速占领东山岛与大陆联系的唯一通道八尺门渡口，切断守岛部队的退路和堵截大陆部队对东山岛的增援；以突击大队突破解放军守岛部队的前沿阵地，攻下200高地，然后插入纵深与伞兵会合，在四至八个小时内占领全岛。

应该说，单纯从军事角度上看，这一作战计划堪称严密。然而，这个计划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民心民力对战场的影响。

在激烈的守岛阻击战中，刚刚解放三年的东山人民用英勇的行动保卫新生的政权，支援守岛部队。他（她）们冒着枪林弹雨，为坚守阵地的部队源源不断地送上弹药，挑来一担担开水、一桶桶地瓜粥，用担架抬下一个个受伤的战士。而这其中，有不少就是“兵灾家属”。

距离200高地不远的石坛村，有位中年妇女，把两名来不及转移的负伤战士藏在家里，用珍藏了十年的一块嫁妆红布给伤员包扎好伤口，并机智地与前来搜查的国民党官兵周旋，成功地掩护了负伤的战士。这位中年妇女被解放军战士亲切地称为“海防战士的妈妈”，她的名字叫刘杏，丈夫被国民党抓丁去了台湾。

16日晨，一股国民党部队占领了东沈村。这时，乡长和几位干部因忙于安排支前，来不及转移，在一位村妇的帮助下，隐蔽在民兵队部的隔壁几间草房里。这股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位村妇的房子，并架起四挺机枪，因为这栋房子墙壁上写着“民兵队部”的字样。国民党兵用刺刀对着村妇，逼她说出民兵、干部隐藏的地方。村妇沉着冷静地说：“我是一个寡妇，自己都顾不了，还顾得上什么民兵干部。我的儿子被你们抓去当兵，你们可认得他？”国民党兵认为她是“国军军属”，又是寡妇，只好放了她。这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干部的村妇，名字叫叶明花，她的儿子也在1950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

钱岗村一位叫林保桃的“兵灾家属”，丈夫孙罗仔1950年被国民党抓壮丁，这次也随国民党部队登岛。他望着熟悉的家乡，特别思念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。可是，他又担心回家后有生命危险，还会连累家人。经过内心的痛苦挣扎，终于决定豁出去。他利用夜幕掩护，顺着水沟悄悄潜回家。他本想和妻子、女儿见上一面就走，可是，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，久别重逢的夫妻相拥痛哭。林保桃告诉丈夫，东山解放以后，家里没有因为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受到歧视，而是作为“兵灾家属”得到政府的照顾。家里不仅分到了土地，自己还当上了村长。终于，孙罗仔在妻子的劝说下，打消了惊恐和疑虑，留在了亲人的身边。

再回到停泊在海上的“高安号”。军事地图上的攻防标示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让胡琏万万没有想到，在东山百姓的支持下，装备简陋的共军守备部队，始终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岛上核心阵地上，一直坚守到援军的到来。空降到八尺门的伞兵，也被分割包围歼灭，他的“切断共军守岛部队退路和堵截大陆部队对东山岛增援”的计划破产了。16日上午11时，解放军31军91师272团就渡过八尺门海峡登岛作战。17日凌晨，增援的大部队已像潮水般涌上海岛。他无奈地下达命令：“留下部分部队阻击增援的共军，掩护主力向海滩撤退。”17日晚上7时，胡琏的舰队带着退下来的登岛部队仓皇撤离东山，来不及上船的数千名“弟兄”在湖尾海滩，全部被解放军“缴枪不杀”。

毛泽东获悉东山保卫战胜利的消息，高兴地说：“东山保卫战的胜利，不光是东山的胜利，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，而是全国的胜利。”

十天之后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。东山战役之后，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大陆的军事行动。

从硝烟弥漫的东山战役，回到寂静而凝重的寡妇村展览馆，我凝视着挂在墙上一幅幅当年丈夫被抓壮丁的“寡妇”照片，她们是林秀真、林秀春、林宝月、林招玉……每个“寡妇”都有年轻与年老时的对比照，一个是年轻美丽、眼中带着清纯的村姑，一个是满面皱纹、眼中饱含沧桑的老阿婆，这强烈的反差让人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痛。她们本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而平凡的人生，1950年那场兵灾改变了她们的命运。她们是不幸的，国民党军队给她们造成深重的苦难；她们又是幸运的，共产党的德政温暖慰藉了她们的心。她们由衷地感谢共产党，感谢共产党派来了谷文昌这样的好干部。

（下转4版）